

经济起飞与人口障碍

虞沈冠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的总态势是发展和改革。仅就发展而言,涉及到经济、社会、技术、资源和环境诸方面,而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所有发展课题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为了使人们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和由此而引起的经济起飞时的艰难性有个清醒的认识,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工业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的人口状态和成功经验,也看看今天发展中国家在人口与经济问题上的经验与教训,从中或许可以得到有益的启发。

美国学者里宾斯坦(H. Leibenstein)的“最小努力与人口规模”相互关系的理论模式,对于说明当前我国经济起飞时的人口困境,也许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要实现这个跨世纪的理想,绕开人口障碍是不现实的,唯有实行有效的人口控制才是正确的选择。

一、工业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的人口状态

十九世纪中叶是世界经济史上的新纪元,先是从英国,继而又波及西欧、北欧,发展到欧罗巴系统的海外各国,都相继发生了产业革命,这场革命后又影响到东南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那里也先后开始了近代的经济成长。

下表为14个工业发达国家各自起飞时期的人口主要指标。从人口规模来看,总人口的差异相当大,从澳大利亚的120万到日本的3700万,14个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人口在100万以上,因此可以说,这些国家无须跨越人口这个台阶而直接得到腾飞。相反地,由于人口规模较小,这些国家反而感到劳力不足,市场狭小,经济发展缺乏后劲,因而迫切需要鼓励人口增长。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这些国家不但总人口规模不大,而且人口密度都很低,只有日本和比利时,每平方公里超过100人。除了北

表 1 工业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的人口状态

国 名	起飞开始期	总人口(万)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抚养系数 (%)
英 国	1765—1785	770	51	36	29	0.7	77.9(1821年)
法 国	1831—1840	3260	51	29	25	0.4	51.0(1851年)
比 利 时	1831—1840	410	139	34	26	0.8	61.8(1846年)
荷 兰	1831—1840	270	82	35	24	1.1	—
德 国	1850—1859	3100	56	35	27	0.8	67.2(1880年)
瑞 士	1865	260	53	30	26	0.4	53.0(1860年)
丹 麦	1865—1869	170	43	31	20	1.1	64.4(1870年)
挪 威	1865—1869	170	5	30	18	1.2	72.8(1865年)
瑞 典	1861—1869	390	9	32	20	1.2	63.1(1860年)
意 大 利	1861—1869	2500	87	38	30	0.8	62.3(1861年)
日 本	1874—1879	3700	100	36	27	0.9	56.3(1875年)
美 国	1834—1843	1460	3	52	—	—	80.2(1850年)
加 拿 大	1870—1874	360	0.4	37	19	1.8	82.8(1871年)
澳大利 亚	1861—1869	120	0.2	40	18	2.2	64.3(1901年)

资料来源: [日] 大渊宽等:《经济人口学》,第48页。

美外，各国人口的平均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人，实际上有半数国家是在这个人口密度的水平上开始起飞的。值得注意的是，除美国和澳大利亚外，其余国家的人口类型均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说明在产业革命的同时，也伴随着生育率革命。一般认为人口转变是继产业革命后而产生的，由于生育率的下降迅速接近先行下降的死亡率，使人口自然增长率减缓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低自然增长率导致抚养系数普遍升高，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前程，因此，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经济起飞时碰到的人口问题是人口偏少，劳力紧缺，但这些国家致力于发展新技术、研制新设备，走一条以技术装备来代替人力因素的工业化道路，促进了现代文明的发展。

发展中国家的前身大都是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附庸和殖民地，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始终扮演农业国的角色。传统的农业是一个滋生人口和劳动力的巨大温床，这一方面是繁重的体力劳动需要大量的劳力，另一方面也由于农业的抚养力相当大。从对劳动力的需求来看，农业劳动力在未达到饱和之前是多多益善，而工业劳动力的缺乏可以通过提高技术水平和机械化程度来弥补，故造成农业国家人口增长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的两极分化趋势，以致形成今天这样的人口分布格局：约占3/4的世界人口分布在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里，仅有1/4的人口分布在工业发达的国家里。我国解放初，也一度认为人口众多是件好事，未能及时地控制人口增长，结果使全国人口规模在建国40年后整整翻了一番，人们翘首以望的经济腾飞却姗姗来迟。

笔者曾对我国一五以来的国民收入增长、人口增长及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差距进行过定量分析，发现70年代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此之前，国民生产的增长有相当一部分被人口的高速增长所抵

销，因而人均国民生产一直处在一个低水平的徘徊状态。然而进入70年代后，由于大力开展计划生育工作，人口高速增长的势头迅速减退，人均国民生产的增长明显出现转机，但这仅仅是起步阶段，真正的经济起飞出现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六五期间，社会总产值以11.2%的速度猛增，而人口增长已减小到1.2%，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相当于人均产值）明显拉大了。因而，我们将国民收入增长，人口增长和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按照其不同阶段的形态特征，分别作如下表述：70年代以前是“低、高、低”，70年代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低、低、中”，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便是“高、低、高”。但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都有其固定的周期性规律，有时这两种波动相遇，也会出现令人担心的局面，一方面经济上处于低潮，而人口出生恰遇高潮，这就使人口经济的良性循环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对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而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力争扭转不利的局面。经济上暂时受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弥补的；但是人口控制上的失策，将会造成全局性的影响，且其影响是长远的，也是无法弥补的。因此，要使经济得到腾飞，关键的是把人口控制在一定限度以内。

近代经济增长的特征是，总人口的高增长率往往伴随着人均产值的高增长。与此对比，近代以前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人口与总产值的持续增加，但看不到人均产值的提高，且那时的增长率也比近代低得多，实际上经济与人口在短期内表现为循环变动，而从长期来看处于一种近似于停滞的状态，被人称为“马尔萨斯困境”。现在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处在这种“马尔萨斯困境”中，如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经济增长率很低，其中大部分又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人均产值的增长率停留在只有1.5%的低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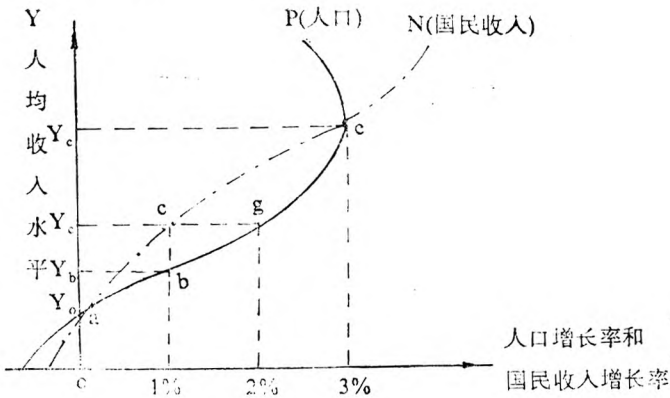


图1 收入水平与人口增长率的关系 (据里宾斯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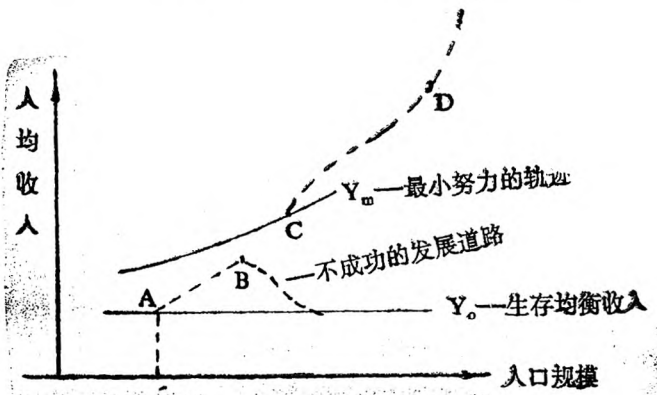


图2 最小努力与人口规模的关系 (据里宾斯坦)

所以很难从贫困的循环变动怪圈中摆脱出来。而对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率都不低,而且作为整体与发达国家比,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还略微超过发达国家一点。由此看来,人均产值的地区差距在这20年中几乎没有缩小,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所以真正实现经济起飞的国家和地区实在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除了真正搞工业起家的亚洲“四小龙”以外,就是靠石油致富的中东国家,尽管拉美各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很高,但人口的剧增吞食了其大部分成果。这些事实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时普遍存在着人口障碍问题,想绕开它是不现实的,只有采取控制人口的方法,才能越过它。

二、经济起飞时的人口因素作用

德国经济学家蒙伯特曾经说过,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松弛的因果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函数关系”。在研究人口对经济的影响时,无论是汉森的长期停滞论,哈罗德和多马的增长论,还是凯恩斯的理论都把人口放在外生变量的地位。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论中,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等不再是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而必须纳入经济体系中去,这些因素与经济增长是一种循环的关系,也必须作为循环的关系来看待。故许多学者在讨论人口与经济关系时,常分为三种情况来论述,即人口对经济的关系,经济对人口的关系以及人口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等

日本经济起飞的成功,既有人口因素的贡献,也有经济成长本身的贡献,而且后者的贡献是主要的。根据日本资料,人们不难发现,50年代以来,在控制人口

增长这个总的方针下,日本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始终处在比较和谐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人口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始终较大。

美国学者里宾斯坦提出的收入水平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图(如图1所示),也许是对经济起飞过程中人口因素作用的最好说明。在该图中,P表示为维持相应收入水平时的人口增长率曲线,N表示与人口增长率相等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曲线。纵轴上的a点表示既无人口增长又无国民收入增长条件下的生存均衡点,而在Y₀点上,人口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均高达3%,可定为经济起飞点。如此说来,处于a与e之间的各点上(如c点),即使与人均收入Y_c相对应的人口增长率为2%(如g点),国民收入增长率也只

不过是1%（如c点），在这种不均衡状态下，人均收入将下降到a点才能达到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人均收入水平达到e点时，才能产生相应的人口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并达到新的均衡。如越过e点，就会产生比人口增长率更大的国民收入增长率。显然， Y_0 表示临界最小人均收入，在此人均收入水平上，人口增长率和国民收入增长率均为3%左右。现在我们来观察一下人均水平超过临界值后N和P两条曲线的发展趋势，显然这两条曲线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了，而人口增长曲线向内收缩，表明经济起飞后即将孕育着一场生育率变革，这几乎是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所经历的必然过程。

里宾斯坦也曾用“临界最小努力”的理论来说明今日发展中国家起飞时的人口状态的意义。如上页图2所示，直线 Y_0 表示生存均衡收入， Y_m 为最小努力的轨迹， Y_0 与 Y_m 之间的部分表示最小努力的大小。由于 Y_m 这条曲线向右上方弯曲，意味着人口规模越大，摆脱最低生存水平所需的最小努力也越大。拿我国来说，人口规模达11.3亿，每年净增1000—2000万人就相当于世界上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如此巨大的人口基数加上迅速增长的势头，使我国的经济很难一下子腾飞起来，而且腾飞时所需的努力要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要大。在图2中，A点表示生存均衡点，即为高出生率与高死亡率相等的均衡点，B点表示人口增长的初期阶段，此时死亡率开始下降，而出生率却居高不下，但此时还很难判断今后经济发展的趋势。 Y_m 上的C点表示在经济发展中进这维谷之际保持均衡的重要点，此时，出生率尚未大幅度下降，与死亡率之差仍较大。D点表示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生率的下降已逐渐接近死亡率。这就说明，在经济起飞时，出生率应快速追上先行下降的死亡率，迅速实现人口类型的转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步的发展。否则，即使该国的经济努力已经接近C点，也仍然

会下滑而走上不成功的发展道路。这正如某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和撒哈拉以南国家的真实写照。如果我们不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话，也必然会重蹈这个覆辙。

三、我国的产业革命与人口转变

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大多经历了一条先产业革命后人口转变的发展道路。中国的人口转变可以说是世界一大奇迹。如果以1971年和1983年分别作为突破30‰和20‰的出生率大关年份的话，则我国完成人口转变的间隔时间仅为12年光景。这种情况虽然符合德国学者马肯罗德所谓的“转变过程加速”的假设，但仍未能对此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这样人口转变先于产业革命的先例，如果按里宾斯坦的理论模式，中国是不可能在今年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人口转变的。实际上，经济变量和人口变量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多元性的相互依存关系，这种人口与经济之间“松弛的因果关系”使产业革命和人口转变的先后顺序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在某些媒介变量加入的情况下，这种顺序很有可能被颠倒过来。而这里所指的媒介变量包括政治因素、心理因素、社会因素乃至技术因素等，当某些媒介变量的作用超过经济变量作用时，就会产生这种异常现象。如在我国的人口转变过程中，节育和避孕措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社会制度、群众觉悟和社会福利等因素也有利于人口转变，这就为实现人口转变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中国和印度相比，经济发展水平相差不大，但社会制度迥然不同，尽管印度政府较早地采取计划生育措施，但至今仍未实现人口转变，而我国却在短期内很快地实现了，这说明社会制度和其它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死亡率的决定因素很单纯，只要考虑到经济收入效应和技术进步这两个因素就够了，如果其它因素不变的

（下转第40页）

能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改变农民落后的生活方式。由于对子女的依托感减少了，对孩子的需求也会随之降低。

第三，福利化（包括医疗保健的发展，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社会其它福利措施的广泛实行）可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对社会保障的担心；把子女在家庭中所承担的劳动力角色及社会保障角色代之以完善的社会福利事业，会减少家庭对子女的依赖。

第四，秩序化（指社会的有序管理和行政管理）可以起到打击歪风邪气，减少民事纠纷，树立良好社会风气，起到有效防止以众欺寡，以强欺弱的作用。用组织的力量和行政权力来代替家族势力以维护人们的基本权力和利益，改变人们依靠和追求宗法势力的思想。

第五，政策优化可以降低人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例如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提倡发展各种合作经济和互助组，发展社会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调济农村劳动力余缺不均的现象，有助于减少家庭对劳动力的需求。实行“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政策，有利于解除人们对社会保障不足的后顾之忧。实行保护孤寡老人及身边无子女老人的政策，有助于防止以众欺寡，防止某些“大户”依仗人多势众欺负弱者。

第六，教育普及化有助于改变人们的观念，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树立现代人口意识，接受和适应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从而减少对子女的需求。

总之，子女角色效用的替变，需要一定的宏观条件——机械化、城镇化、福利化、秩序化、政策优化、教育普及化。而人口出生率的自然降低，又必须有一定的微观基础——子女角色效用的替代或转变，降低子女角色的效用，改变人们的价值取向。但微观基础受宏观条件的制约，因此，影响人口出生率长远的、根本的因素是宏观条件。正因为此，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促进全社会的机械化、城镇化、福利化、秩序化，进一步发展教育，优化政策，将是我们为降低人口出生率而必须长期努力的目标任务。

（作者工作单位：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
(上接第20页)

话，死亡率可以说是收入水平的简单递减函数。而影响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很多，大致为：（1）妇女的教育水平和社会地位的提高；（2）从事非农业生产妇女的增多和生育、抚育的机会成本的增加；（3）传统的多子多福思想观念的转变；（4）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5）教育的义务化和子女的经济价值的下降；（6）老龄保障与其他保障制度的发展；（7）社会的流动性增大，（8）婴儿死亡率的降低；（9）廉价而安全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可以说，中国在上述9项因素的总体水平上均比印度强，甚至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也是名列前茅的。但就单项因素来看，可能就不一定占绝对优势。总的说来，中国为典型的东方文化传统的国家，

她的生育率革命跟日本、朝鲜、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有许多共性，跟台湾、香港等地区更是一脉相承，这种外部环境造成中国这块大陆较早地实现人口转变。所以说，我国走的是先实现人口转变后实现经济腾飞的道路，这是由于我国在特定的环境和条件下形成的，如果我们也走西方国家先发展经济后控制人口的道路，则必然会陷入“马尔萨斯困境”中去。

可以说，对生育率革命来说，我国的前途就是一条：必须继续严格地控制人口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四化事业得以早日实现。

（作者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